

文章编号: 0375-5444 (1999) 04-0365-08

人文主义与后现代化主义之兴起 及西方新区域地理学之发展

马润潮

(美国俄亥俄州立爱克伦大学地理及规划系, 美国)

摘要: 近 40 年来, 西方人文地理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50 年代末期开始计量革命, 70 年代初开始, 人文主义、行为主义、结构主义与后现代化主义等观念涌现, 它们对西方地理界起了不同程度的影响。演变至今, 人文地理学可说是一个百花齐放的多元化时代。人文主义与后现代化主义在 70 年代与 80 年代期间, 先后出现于西方地理学。二者与上列其他观点有根本的不同。在地理学上, 它们强调各地情况都有其特性。同时, 批判性的社会理论也在地理学中占了日益重要的地位。从 80 年代开始, 出现了一种新的区域地理学, 它强调了人的能力及角色与社会结构如何影响地方特性的形成, 也探讨了外在大环境以及地方力量对社会形成的关系。

关键词: 人文主义; 后现代化主义; 新区域地理学; 地方研究

中图分类号: K901; **文献标识码:** A

1 前言

二次大战后, 尤其是从 60 年代起, 西方人文地理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它连续不断地朝多元化发展。这些变化从基本上改变了西方人文地理学, 尤其是区域地理研究的性质, 使人文地理由战前孤独地在内部自行演化, 转变为战后与其他社会科学的互动, 并从经济学、社会学与政治学引进了一些新观念。此一转变大大地丰富了地理学的理论基础, 也相当程度地提高了其学术地位, 基本上将人文地理学从以前侧重于区域描述, 改变为现在的对人与社会、人与环境、及人与地点或地方关系的诠释。本文试图就人文主义 (humanism) 及后现代化主义 (postmodernism) 的兴起及其近年来对区域地理的影响, 作一简单的陈述及分析。

在人文地理的演变中, 最有影响力者, 首推在 50 年代末期兴起的计量革命。但从 60 年代末期开始, 它逐渐地受到了来自地理学以外及产生于其内部的种种批判。可以说, 由 70 年代早期开始, 西方人文地理学 (包括经济地理及城市地理) 的发展, 皆衍生于对计量革命的不满。虽然计量革命对西方人文地理学的发展曾作出过巨大的贡献 (尤其是在研究方法、数据处理及强调理论重要性三方面), 然而它却在想要达到其自行设定的目标方面, 颇令圈内及圈外人士失望, 因其成果并不是很好。因此, 有些曾对计量革命作出过杰出贡献

收稿日期: 1999-02-08

作者简介: 马润潮, 男, 教授。原籍陕西省米脂县。美国密西根大学地理系博士。在美从事有关中国城市、人口及经济地理问题研究多年, 并讲授西方地理思想史。E-mail: larryma@uakron.edu

的学者,如 Torsten Hagerstrand, David Harvey, Gunnar Olsson 及 Allan Pred 等,从 60 年代末以后,皆改弦更张,另谋新野;而一向对计量革命缺乏兴趣的学者,在计量革命白热化时期静观其变或噤若寒蝉后,也开始提出他们自己认为人文地理应走的道路。其结果是在最近 30 年来,西方人文地理学,可说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使识者与不识者皆眼花缭乱、目不暇接^[1~3]。但如此多元化发展,一方面虽丰富了地理学的观念并强化了其理论基础,但另一方面却也弱化了原本就不强的学科内部的凝聚力。

2 西方人文地理学理论发展之方向及其问题

近 30 年来,西方人文地理学已摆脱了以往描述性的治学方式而大力加强了其理论成份。可以说,计量革命主要的贡献并不在于其推广或强化了统计方法的运用,而在于其强调了研究地理问题时,应该以理论为主导及以发展理论和模式为其终极目标。计量革命不单是它能确切地将一些问题量化,更重要的是它开启了西方人文地理学强调理论的先河。故它也是一种理论运动。在强化西方地理学方面,它功不可没。这一运动的哲学基础,是属于逻辑实证主义(logical positivism)或逻辑经验主义(logical empiricism)范畴,它强调了唯有能通过公正客观的逻辑方法(特别强调了数学方法的使用)验证后的事实与结论,才能被认为是知识^[4,5]。一切不能验证或通不过验证的东西,包括形而上及唯心之物如宗教、美学、宇宙论及知识本体论等,皆不是知识。其追求目标,是高度抽象的宏观大理论及法则。而此派门徒在建造大理论时,是将复杂的事物加以大量简化,偏重事物内主要元素间的相互关系。其学术地位高低,取决于其通性大小:愈能“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理论则愈好^[6,7]。

就其在人文地理学中的发展而言,逻辑实证主义(当它与地理学相并讨论时,也有人将之称为地理学中的“科学主义(scientism)”)假设了在地表上的事物以及人类活动,都是有序可循的及有一定规律的,故地理现象应是有空间规律或形态的。其门徒认为,地理学者的任务,就是要极为客观地、不渗入研究者个人感情及主观意志地将这些规律寻找出来^[8]。很显然,这样的基调源于自然科学,要求人文地理学去追求自然科学的目的,要把人文地理学与自然科学在方法及目标上画等号。

必须承认,计量地理学家所希望达到的目的,是开发各类“定律性的”及“似定律性的”空间关系法则^[9]。然回首顾之,到了 60 年代末期,在经过了十多年的埋首苦心经营之后,除了少数的理论以外(如中地学说、一些土地利用模式、城市序位律、重力模式等),理论成果可谓不彰^[10]。而这些理论不是假设太不切实际,就是有其它的局限性(如有的是实用性差,有的只是经验规律而缺乏理论基础,而有的则过分地将复杂情况简化得远离事实了),应用起来有困难,令人失望。从 70 年代初期开始百家齐鸣,家家都批评了科学主义的地理学之失误,各门派皆来重新为人文地理学把脉,提出了各种观点。

3 人文主义的出现

在 70 年代计量革命受到反弹的同时,西方人文地理界也相继受到了心理学、结构主义及人文主义的影响,而出现了行为主义地理(bahavioral geography)、马克思主义地理(Marxist geography)及人文主义地理(humanistic geography)等学派^[11~16]。而在 80 年代

初, 又有后现代化主义地理出现。

人文主义地理不等于人文地理学。前者只是后者的一个分枝, 而后者一般是指除了自然地理及地理技术以外的地理学。人文主义则特别注重一切事物的诠释皆基于人的思想、感觉与经验, 是以人作为出发点的。人文主义地理学家是最早对计量地理理论基础发难者, 对其批判始于 60 年代末期而于 70 年代加强了火力。其从者批判科学主义地理学在探讨问题及开发理论时, 完全忽略了人的因素, 特别是人所能发生的作用。同时, 他们更点出了以逻辑实证主义为基础的计量运动, 其对知识的定义及看法, 有太强的排他性、垄断性及霸权心态。人文主义者认为单单注重规律的寻求而舍弃对独特性事物的探讨, 是忽视了这个大千世界的绝大部分事物。

人文主义地理认为世间的事物, 并不是早就客观地存在着、在等待着学者们来发掘其规律与形态的, 因一切事物的存在与否及其存在状况, 皆会因当事人的文化、背景、经历及主观意愿而异。也就是说, 这个世界不是只有一个而是有多个的, 而同一事物在不同的人看来, 也会不同。就地理现象而言, 这一观点强调了地球表面事物的异质性及独特性, 而不强调其通性。当然, 人文主义地理学家也就没有兴趣去找寻什么通则。也可以说, 人文主义地理的终极目标, 不是要像科学那样来预测事件的后果, 也不是要建立什么放诸四海而皆准的大理论。其目的, 乃是要了解事物对人的意义。然就其研究成果而言, 因人文主义地理学缺少成套的操作方法及观念可资传授及应用, 除了少数学者外, 研究成果也不多。故有人认为人文主义地理充其量也不过是只达到了批评科学主义学派的境界^[14]。

4 后现代化主义之出现

后现代化主义在西方也是一个较新的哲学观点。自从 Lyotard (1984) 的书及 Jameson (1984) 的论文刊出后^[17, 18], 即引起了人文地理学家注意。然学者对它看法颇不一致。一些人对它的敌意甚强, 因为它被认为是一种怀疑主义及它批判了所有的大理论, 得罪了各阵营的人马。另一些人对它则持怀疑态度, 因它的视野较之人文主义更为多元。但回过头来说, 因后现代化主义强调事物皆有多元性, 也可以说它也是一种大理论。

后现代化主义的出现, 可说起始于西方哲学家在 18 世纪启蒙运动以后, 对“现代性”演变的诠释。它对用理性、逻辑及依靠所谓的客观事实及证据来说话的科学思维方式提出质疑, 怀疑仅以科学的思维来论断事物, 是否能让社会从历史传统及宗教的捆绑中解脱出来而取得较多的自由、博得较大的自主性, 从而使社会变得较能令人满意。后现代化主义反对作高度概括性的、以偏盖全的、一概而论的、及意欲一网打尽的大言论。此种反传统的批判, 在 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 哲学家傅寇的贡献尤多^[19]。他指出人类历史的更迭, 并非是有规律性的。后现代化主义则是对多样化的、异质性的、权宜性的、非延续性的、随机变化性的及地方性的事物感兴趣。它反对传统权威及僵化的大思想框框, 支持活泼的新生事物。它认为历史演变及社会机制与进程, 在每个地方都是不相同的。它认为这个世界的结构并不是整齐有序的而是像一个多变的万花筒, 它甚至认为世上并没有一成不变的事物, 也没有所谓永恒的真理。它不接受内部组织合理完美而外观高雅华丽的大理论能够充分反映复杂的世事, 因为理论建构物只是观察者个人创建出来的“代表性的真理”而已, 并非就是真理, 写出来的纸上世界也不见得就是唯一的世界, 因景观的内涵会因人而异^[20]。后

现代化主义主张在探讨问题时, 应特别注意小范围空间内的地方文化情况, 它强调事物都是在某种特定的时间与空间情况下才能出现及存在, 故观察者在探索问题时, 应考虑到问题的特殊性, 并学习能将欲探讨之事物予以“特定情况化 (contextualize)”。

后现代化主义对人文地理的影响, 可说是始于 1984 年美国杜克大学比较文学教授纪木森 (Frederic Jameson) 在《新左评论 (New Left Review)》的一篇论文。在剖析社会及历史变迁时, 他强力肯定了空间地位的重要性, 认为在 60 年代以后的西方后现代化社会中, 左右我们每天的日常生活、心路历程及文化语言者, 是种种的空间而非时间。从 80 年代起, 地理学者们也开始积极地探索地理学在社会理论应占的地位, 并从社会学等社会科学借用了不少观念^[21]。在 1983 年, 更有一份地理学家主持的期刊问世——《环境与规划 (D 部): 社会与空间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此刊物至今仍然在地理理论的发展上, 占有甚为重要的地位。同时, 后现代化主义强调非传统、异样化事物^[22, 23], 不但促进了地理学者对少数人群问题的研究, 特别是有关族裔或族群研究, 也打破了以往仅以男性观点为出发点的传统地理学, 开创了强调女性观点及男女空间行为有差异性的性别研究及女性地理 (feminist geography) 的领域。后现代化主义的多元属性, 最近也被用来诠释美国的后现代化的城市性, 将洛杉矶近年来的多元化城市结构作为例证^[24, 25], 向美国城市结构理论多年来一直以芝加哥为实证蓝本的传统挑战。

按在南加州大学的后现代化地理学家翟尔教授^[23]的看法, 后现代化现象极为广泛, 特别是在文学、艺术、建筑设计及人的思维各方面。他认为后现代化主义地理可从三方面来理解。第一, 它代表一种能看得见的新风格或方式。它反对在现代化主义审美观中常见的死板及严峻的形式主义, 如反对用一式一色的大玻璃窗的高层办公楼的单调的建筑形态, 赞同新旧建筑风格混合使用, 即为最佳例证。第二, 它是一种新与旧时代“激烈决裂”的象征, 也代表了一个新时代的来临。但这一新时期文化的特征, 到底应累积到何种强度才能算得上已达到“决裂”的地步, 则尚无定论。第三, 后现代化可以被视为一种用来反抗现代化主义所强调的理性主义的一种方法。如前所说, 后现代化主义哲学家不赞同大理论, 不认为理论能够反映“实况”, 反对任何有霸权心态及富排他性的学术观点, 认为真理并无绝对的标准。它主张事件及观点皆非一成不变的, 其存在是有条件性及不稳定性, 是在某些情况下才能产生的。但正因为如此, 后现代化主义并没有任何统一性的理论, 因而反对它的人认为它是一种反权威及反理论的学术“拆台运动”。

5 新区域地理与“地方研究”之兴起

在受到了来自各方的批判之后, 以往追寻大理论、定律、高度抽象的模式及将复杂的事物过分简化的许多地理学者也早已放弃了其自大心态而转变为较能兼容其它观点, 展示了他们也能改变、也是有学术灵活性的。同时, 人文主义及后现代化主义的影响力也相对增强, 而在 80 年代以后, 一种新的区域地理也逐渐抬头。新区域地理学传统的区域地理学的差异较大。传统的区域地理学不注重理论及观念, 其文字也较枯燥及缺乏可读性, 因它主要是以静态的描述或以记流水帐的方式来登录一个地区的景物, 鲜能刺激读者的思维。而它与新区域地理也有相似之处, 即二者皆肯定区域的特性与异质性, 也都不追求任何大理论。但新区域地理则甚为侧重人在区域性质的产生、延续与演变时所起的作用。其研究

对象, 至今主要局限于资本主义社会。此类学者注意到了一地之时空及文化的特性, 对资本主义在该地产生过程及影响, 都起了些作用。

区域地理在近年来有复苏的现象, 但也有些争议^[26]。新区域地理在 80 年代兴起, 受 4 位西方学者影响较大。首先, 英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季登思^[27]的“社会结构化”理论, 对人文地理颇有影响^[28]。季登思企图探索人的能耐或角色与社会结构之间的相互关系, 而他认为此种关系必须落实在一个具体的地方。这就强调了地方在社会演变中的重要性, 提高了地方研究的地位^[29, 30]。同时, 美国华裔地理学家段义孚教授^[31]也极有说服力及清楚地阐明了地点或“地儿”(place)与空间(space)之不同, 指明了“地点”是含有丰富意义的, 因人们会对它产生感情, 它也有其特性或“地点的身份特色”。它除了为人们提供生活空间外, 也是人们价值观念及经验的汇集点。

同时, 著名的美国地理学家浦瑞德^[32, 33]也在 80 年代阐明了“地点”的重要性, 指出人与地的不可分性。在一个地点的人是能在该地起重大作用的主角, 影响该地的情况, 但他们也同时会受到外界的大环境(包括历史、社会、经济制度及主要文化取向)的支配, 也会被动地受当地的自然环境、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及人际关系系统的影响。一个地点的人的行动、思想、经验及人们赋予该地的意义与价值, 总是在不停地“变为”该地的一部分, 它们的产生是地域的宏观及微观因素互动的结果, 特别是地方情况对外界大环境反应的结果。

英国女地理学家马瑟教授^[34, 35]也强调了“地点”的重要性。她指明了每一个地方都有其当地历史遗留下来的独特性。新区域地理的任务, 不是老式的地区描述, 而应是探明及分辨出什么是当地特有的社会经济情况, 什么是来自外部大环境而影响当地发展的力量, 并探讨这两种宏观及微观力量间的相互关系。在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劳动力的地域分工问题时, 她认为每一个地方的情况都不一样。她的主要观点是: 要想了解某地工业的空间形态, 必须要认识到该地社会经济的变化, 尤其是当地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力量。她认为一个地方的社会结构, 是与该地的劳动力空间分工密不可分的。以此观点为基础, 英国威尔斯大学地理学教授库克^[36, 37]于 1984 至 1987 年间展开了一系列的地方研究, 其总的目的是探索全国性及地方性的经济重构情况, 看看中央与地方政策, 对英国地方工业发展有何促进或限制作用, 进而了解地方经济及社会重构的机制与进程。其结论支持了“地点”或“地方”的重要性, 认为它在经济发展所产生的空间不平衡现象及其延续中, 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此一研究更指出了地点或地方不仅只对自上而下的力量起反应作用, 它本身也有自变的力量。到了 80 年代, 西方区域地理早已脱离了 50 年代以前的以描述为主的治学方式, 转变为对特定地点的社会、文化及经济空间性质的剖析了^[38-42]。此种转变, 虽不能断言是后现代主义出现后的直接结果, 但它符合后现代主义的精神则是不容置疑的。它之能在西方人文地理界占一席之地, 也反映了区域地理不再受人歧视了。

6 结论

综前所述, 可以说西方人文地理在 70 年代后的 20 多年中, 已从一味用计量方法及逻辑实证来找寻有广泛适用性的高度抽象化的大理论, 转变为对之失望与不满, 更进一步地产生了百花齐放的现象。在此期间, 学者们对地理学上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 很自然地

不能产生共识: 地理学的学术目的, 到底是寻求通则及事物的通性重要, 抑或是了解事物的特性重要。此问题虽无定论, 但可以说, 后者已从五六十年代的被人轻视的次等学术地位, 进步到今日能与前者理直气壮地辩论的境界。同时, 后者也吸引了不少有才华的学者。因此, 西方许多大学的地理系在 90 年代招聘新血时, 要求新人除了要有专题特长外, 也须有一个区域特长。综观之, 70 年代后人文主义与 80 年代后的后现代化主义观念在地理界的出现, 加上衍生于结构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观念的盛行, 已将以地方研究为基础的区域地理之学术地位, 提高到 50 年来的最高点, 其内容较之传统的区域地理学丰富许多。

总的来说, 人文主义的范畴小于后现代化主义, 可将之视之为后者的一部分。但它们有若干雷同点: 二者皆反对用某些定死的观念框架及自认为是公正的研究方法, 来为模糊的问题定型定位; 二者皆反对用固定的理论模子将复杂的及浑沌不清的大千世界, 硬打下它的理论烙印, 或将某些事物选择性地挂在某个理论框架上, 将之当成强有力的经验证据, 而不去理会那些搭不上理论框架的事物。同时, 二者皆无特定的及统一的观念, 皆认为对一件事物的看法, 是会因人而异的。它们认为这个复杂的世界, 不是用某个特定的观念就可以解释得清楚的。二者也同时强调了人与地方在社会形成及地方特性的演化中, 皆可起十分重要的作用。它们也都承认人有不同的价值观及人是主观的及有感情的动物。人的主观意志及力量与地方的力量虽不能超越现有大环境及大型力量(如社会制度、生产方式、历史大传统及社会结构等)在影响地方事物的主导地位, 但它有能力适应来自外部的力量, 并有限度地在地方上将之改变, 也有能力自行影响当地的特性。当然, 二者也都认为去探索及发现各地的特点特性是有意意义及有价值的学术工作。

然而, 反对后现代主义者为数也不少。他们批评它过分强调了学术的自由化与多元观点, 因而导致了思想无序及无政府状态。结构主义者认为, 若仅注意事物表面上的复杂性而忽略了社会形成的主导力量(即所谓的“深层事实”), 无异是舍本逐末、舍大取小, 抓不到问题的主要关键。然而从事地方研究者认为, 他们不单注意到来自国际及全国的社会经济制度的重要作用, 也强调了当地的人及其它因素的重要性, 也很重视各地的复杂性及事物时间上的前后关连性及空间位置。应该指出, 后现代主义并不反对追求理论, 但认为理论应符合当地情况而不应过分抽象。它仅主张发展能在特定地点适用的理论。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 新生事物层出不穷, 许多地方的社会经济情况也日新月异。各地对改革开放的反应不一, 对来自政府的“上有政策”及来自地方的“下有对策”各地皆有所不同。原有的社会大制度(包括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文化力量、社会结构形态等)之影响力, 仍不同程度地在各地存在。若要想建立新的中国区域地理学, 不妨考虑借用西方人文地理学中晚近被使用的一些观念, 包括社会形成、社会结构化、人及政府所扮演的角色、社会发展之机制过程等等。在中国历史上及现状下, 地方上的社会精英与地方政治权力密不可分, 此点尤其值得我们从“人的角色”的观点来探讨区域发展的问题。在许多地方, 地方领导既是属于有自发性的“人的角色”的范畴而又是行政结构中(如地方政府之组织, 特别是村、乡及镇的行政组织中)的重要组成份子, 其角色之定位时常不清, 但有一定的稳定性; 也就是说, 这一点在地方研究中, 既有其通性又有其特性, 为区域地理学展开, 带来了复杂性。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 [1] Johnston R J. Geography and Geographers: Anglo-American Human Geography since 1945[M]. New York: John Wiley, 1997.
- [2] Peet J R, Thrift N J (eds.). New Models in Geography (2 vols)[M]. London: Unwin Hyman, 1989.
- [3] Peet J R. Modern Geographical Thought[M].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1998.
- [4] Guelke L. Problems of scientific explanation in geography[J]. *The Canadian Geographer*, 1971, **15**: 38~ 53.
- [5] Guelke L. Geography and logical positivism[A]. In: Herbert D T, Johnston R J (eds.). *Geography and the Urban Environment: Progress in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s*, 1[C]. London: John Wiley, 1978. 35~ 61.
- [6] Harvey D. Explanation in Geography[M]. London: Edward Arnold, 1969.
- [7] Chorley R J, Haggett P. Models in Geography[M]. London: Methuen, 1967.
- [8] Haggett P. Locational Analysis in Human Geography[M]. London: Edward Arnold, 1965.
- [9] Golledge R G, Amedeo D W. On laws in geography[J].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1968, **58**: 560~ 574.
- [10] King L J. The seventies: disillusionment and consolidation[J].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1979, **69**: 155 ~ 157.
- [11] Golledge R G, Stimson R J. Spatial Behavior: A Geographic Perspective[M].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1997.
- [12] Peet J R. Radical Geography: A Alternative Viewpoints on Contemporary Social Issues[M]. Chicago: Maaroufa, 1977.
- [13] Peet J R. Spatial dialectics and Marxist geography[J].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1981, **5**: 105~ 10.
- [14] Entrikin J N. Contemporary humanism in geography[J].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1976, **66**: 615~ 632.
- [15] Ley D, Samuels M S. Humanistic Geography: Prospects and Problems[M]. Chicago: Maaroufa Press, 1978.
- [16] Tuan Y F. Humanistic geography[J].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1976, **66**: 266~ 276.
- [17] Lyotard J F. The Postmodern Condition[M].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4.
- [18] Jameson F. Postmodernism, 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J]. *New Left Review*, 1984, **146**: 53~ 92.
- [19] Foucault M. Power/Knowledge: Selected Interviews and other Writings, 1972- 1977, ed. C. Gordon[M]. New York: Pantheon, 1980.
- [20] Olsson G. Lines of power[A]. In: Barnes T J, Duncan J S (eds.). *Writing Worlds: Discourse, Text and Metaphor in the Representation of Landscape*[C]. London: Routledge, 1992. 86~ 96.
- [21] Soja E W. Postmodern Geographies[M]. London: Verso, 1989.
- [22] Dear M. The postmodern challenge: Reconstructing human geography[J].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1988, NS13: 262~ 274.
- [23] Dear M. Postmodern human geography: an assessment[J]. *Erkunde*, 1994, **48**: 2~ 13.
- [24] Scott A J, Soja E. The City: Los Angeles and Urban Theory at the End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M].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6.
- [25] Dear M, Flusty S. Postmodern urbanism[J].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1998, **88**: 50~ 72.
- [26] Pudup M B. Arguments within regional geography[J].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1988, **12**: 369~ 390.
- [27] Giddens A.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ety[M]. Oxford: Polity Press, 1984.
- [28] Moos A I, Dear M J. Structuration theory in urban analysis: 1. Theoretical Exegesis[J].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1986, **18**: 231~ 252.
- [29] Johnston R J. Places matter[J]. *Irish Geography*, 1985, **18**: 58~ 63.
- [30] Johnston R J. One world, millions of places: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ascendancy of geography[J]. *Political Geography*, 1994, **13**: 111~ 122.
- [31] Tuan Y F. Space and Place[M].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77.
- [32] Pred A. Place as historically contingent process: Structuration and the time geography of becoming places[J].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1984, **74**: 279~ 297.
- [33] Pred A. The social becomes the spatial and the spatial becomes the social[A]. In: Gregory D, Urry J (eds.). *Social Relations and Spatial Structures*[C]. London: Macmillan, 1985. 336~ 375.
- [34] Massey D. Spatial Division of Labour: Social Structures and the Geography of Production[M]. London: Macmillan, 1984.

- [35] Massey D, Allen J (eds). *Geography Matters! A Reader*[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 [36] Cooke P N. Individuals, localities and postmodernism[J].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1987, 5: 408~ 412
- [37] Cooke P N. Back to the Future: Modernity, Postmodernity and Locality[M]. London: Unwin Hyman, 1990
- [38] Gregory D. People, place and practices: The future of human geography[A]. In: King R (ed). *Geographical Futures*[C]. Sheffield: The Geographical Association, 1985. 56~ 76
- [39] Gregory D, Urry J. Social Relations and Spatial Structure[M]. London: Macmillan, 1985
- [40] Urry J. Society, space and locality[J].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1987, 5: 435~ 444
- [41] Entrikin J N. Place, region, and modernity[A]. In: Agnew J A, Duncan J S (eds). *The Power of Place*[C]. Boston: Unwin Hyman, 1989. 30~ 43
- [42] Warf B. Postmodernism and the locality debate: Ontological questions and epistemological implications[J]. *Tijdschrift voor Economische en Sociale Geografie*, 1993, 84: 162~ 168

Humanism, the Rise of Postmodernism and the Development of New Regional Geography in the West

Laurence J. C. Ma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and Planning, University of Akron, Akron, Ohio 44325 USA)

Abstract: In the last four decades, human geography in the West has experienced major changes in both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orientations. These changes began with the appearance of the quantitative revolution in the late 1950s and the 1960s which greatly enhanced the position of theory in geographic scholarship. Adopting logical positivism as its theoretical foundation, early quantitative geographers clearly displayed epistemological arrogance who considered views of knowledge other than their own as either invalid or insignificant. However, by the late 1960s, both the revolutionaries and the bystanders had become disillusioned about the revolution's future as it had failed to achieve what it had set out to do earlier: the development of geographic laws and metatheories. This set the stage for the emergence of a host of competing schools of thought in human geography, ranging from behavioralism, Marxism and humanism.

Postmodernism made its appearance in American human geography in 1984. It rejects any narrow epistemological stance that sees the complex world through only one predetermined lens. It argues that no metatheory is capable of accounting for the complex reality, and it does not favor any one type of represented world over others. It emphasizes the importance of difference, heterogeneity, context and human agency, which have since found their way in a new regional geography centered on the study of localities. Local conditions in China since the 1978 reforms have varied greatly, with places in different regions acquiring unique place identities. Such a condition is suitable for the use of postmodern perspectives for place-based studies.

Key words: humanism; postmodernism; new regional geography; locality studies